

文化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协同创新中心专栏

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中的宗教信仰因素

靳会新

【内容提要】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宗教因素对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整个社会的态度体系的深层影响也即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却是最为根本的。“第三罗马”论与“弥赛亚”观浸透于俄罗斯人的意识之中，铸就了其民族强烈的“救世”使命感，进而演变为大国主义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俄罗斯东正教特点与俄罗斯村社制度、习俗的契合，东正教对皇权的依附关系，俄国知识精英精神与东正教教义的一致，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信奉集体主义，崇拜强权，爱走极端等特征的根源。

【关键词】俄罗斯 民族性格 东正教

【中图分类号】G13/1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4) 01-0076-0008

“民族性格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该民族的文化。”^①俄罗斯民族性格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特征包括强烈的民族主义，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信奉集体主义，崇拜强权，爱走极端等。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东正教的影响作用巨大。

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②。“甚至，它是指在没有足够理智认识保证一个事物为真实前提下，就对其无条件接受和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信仰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有机统一，信仰在个体身上既能外化为社会实践，参与人类的创造，又能内化为心理的依托，找到人生的绝对依据，从而可能实现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上的双重超越^③。宗教信仰是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在浩渺的宇宙与时间的长河中，单独的个体是如此渺小与无助，宗教给了那些信仰者

一、宗教信仰对民族性格形成的作用

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相信和尊重，

① <http://www.baike.com/wiki/>

② 《辞海》（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6页。

③ 参见田克俭：《民族精神与竞争力》，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83、98页。

【作者简介】靳会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学刊》主编，高级编辑。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从彼得到普京：俄罗斯书刊检查的实践与评价》（项目编号：12YJA860007）

心理依托和精神力量。由于宗教是对“世界和人生应当怎样”的一种回答，因此宗教信仰决定着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及审美观。也可以说，宗教是以精神活动为取向的价值体系的根基，是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人们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对外界事物做出的反应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要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念，对某一事物所持的态度是由该事物的价值决定的，价值表明了客体对人所具有的意义。什么是我们支持的、拥护的，什么又是我们否定的、反对的，要视其对我们的意义而定。是拥护还是反对，是支持还是抵制，这就是一种社会态度，是主体对客体对象的反应倾向。社会成员对某一事物形成态度的关键因素是需要，价值观念则是对某一事物需要与否的衡量器，决定着人们行动的方向，赋予行动以动力，对行动进行规范，对行动中的偏差进行调整。一个人会对人类社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秩序、社会生活的运行方式，对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标准形成自己的看法、期待和理想，据此选择信奉的规范体系，如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专制体制还是民主自由等等，并决定对现存社会制度、社会现象采取行动^①。

宗教是制约人类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层面的深层结构和核心内容。文化人类学认为，宗教是支撑文化模式的基本架构，而文化模式在民族性格形成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和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②文化模式以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在社会成员中建立起一套行为评价体系，引导社会成员约束和规范自己的内心与行为。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评价体系，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个体也将被社会接纳，反之则遭到否定和拒绝。人们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方式来适应评价体系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渗透和不断强化，个体的选择通过“认识、情感、意志过程保留在群体的心理结构之中，逐渐形成一定的态度体系”^③，也就意味着这种选择已经稳固下来，一旦一种选择为大多数人共同拥有，成为他们经常采取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也就标志着这个群体形成了稳定的性格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人格特征的形成

与人们的行为方式关系密切，而社会态度又指导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使人们形成独特的社会态度体系的重要因素则是决定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及审美观的信仰。现实中价值有许许多多，其中哪一种最重要？当各种不同价值相比较和权衡时，用什么来换算、折算它们？当不同质的价值不可兼得时，如何取舍？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总会现实地形成一种选择。有研究者将被选为最重要价值的、作为各种价值换算通项的价值，称为本位价值^④。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本位价值观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引导俄罗斯人确立一定的价值目的，选择相应的价值取向，满足其情感心理需要，最终宗教情感就转化为民族情感心理，宗教情感心理就变成一种民族的心理。苏联学者 H. 米特罗欣说：“在民族文化中，宗教不单纯是外壳，不是通过启蒙和教育很容易去掉的表层思想。作为特殊的‘生活科学’，宗教已深入到人们的日常活动里，贯穿于人们的处事态度中。”^⑤

二、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罗斯受洗”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俄罗斯文化、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国家社会发展的走向影响极为深远。

古罗斯与拜占庭最初因贸易和战争发生关联，为扩大贸易而发动战争，随着两国贸易的频繁往来，拜占庭基督教慢慢渗入罗斯。公元 988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赫尔松皈依东正教，立东正教为国教，强迫全体基辅居民到第聂伯河河边接受希腊神父的洗礼，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

俄罗斯接受东正教并非偶然，是罗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接受东正教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在漫长的岁月里，罗斯人一直信奉多神教，有雷神、战神、风神、火神等等，没有一个关

① 田克俭：《民族精神与竞争力》，第 102 页。

②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5 页。

③ 关春柱：《生态学视野下的民族性格演化》，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

④ 田克俭：《民族精神与竞争力》，第 102 页。

⑤ 黄任远：《赫哲那乃阿伊努原始宗教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于神灵的统一概念。980年弗拉基米尔成为基辅大公后，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新的思想政治形式，还曾试图整合多神教。因为多神教信仰不利于国内团结以及国家的管理。其次，接受东正教是国际形势使然。罗斯周边各国纷纷抛弃多神教，改信一神教，其东方是伊斯兰世界，西面的捷克和波兰也已经接受了天主教。多神教代表着落后的文化，基辅罗斯在与其他国家往来中常常感受到他人对这种落后文化的轻视。可见，基辅罗斯接受和引进东正教既是为了国内的统治，也有对外交往的促动。罗斯人接受东正教非一朝一夕之间的事情，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在广大僧侣的努力下，在与多神教整合之后，罗斯民众才接受了东正教。统一的信仰成为国家的凝聚力，促进了各公国的团结，“民族性”和“国家性”的意识开始萌芽。

（一）“第三罗马”论与“弥赛亚”观

在鞑靼蒙古人统治的二百多年中，东正教对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摆脱鞑靼蒙古人统治不久，“第三罗马”理论便盛行莫斯科。

1453年5月29日，土耳其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1472年伊凡三世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亚为妻，以拜占庭国徽为莫斯科国徽，俨然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1492年，都主教佐西玛在复活节期表中称伊凡三世为“君士坦丁堡的新沙皇”，莫斯科是“新的君士坦丁堡”，俄罗斯的沙皇是“普天下唯一的基督教皇帝”。“第三罗马”理论是由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依在给瓦西里三世的奏折中正式提出的。他说：“旧罗马的教堂被不信神的异端攻陷了，第二个罗马——君士坦丁堡的教堂被阿加尔人（土耳其人——作者注）的战斧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第三罗马——由您统治的神圣使徒的教堂，使宇宙之内，普天之下，永远照耀着阳光。……虔诚的沙皇！全部基督教将统一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第三罗马屹立着，而第四罗马永远不会有。”^①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东正教是基督和基督教的唯一真正信仰者的宗教优越感、救世主意识和神权政治观。只有俄罗斯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真正的基督教只存在于俄罗斯，俄罗斯民族注定要完成拯救世界的重任，有义务在世上实现“千年王国”。

1547年教会加冕伊凡四世为沙皇，俄罗斯东

正教向独立的目标接近了一步。1589年，君士坦丁堡教会、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安提阿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的4位牧首签署文件，同意建立莫斯科牧首区，并且明文裁定莫斯科为“第三罗马”，称俄罗斯是“优异于以往存在的任何帝国的东正教帝国”。“莫斯科即第三罗马”最终获得了宗教法的承认，俄国东正教会开始以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自居。沙皇成为罗马和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俄国君主政权获得了神圣化的合法地位。在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将东正教教义中的“基督救世”即“弥赛亚主义”传承下去，俄罗斯人以国家强大为荣耀的强国意识、“第三罗马”理论连同东正教的“弥赛亚主义”、基督“感化天下、普济众生”等其他教义，与千年王国说一起浸透于俄罗斯人的意识之中，成了俄罗斯国家自我意识的主导思想，肇始了俄罗斯的大国主义，共同铸就了其民族强烈的“救世”使命感。

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人这一意识做了最好注释：“第二罗马，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政权拜占庭帝国陷落之后，一种意识——意识到俄罗斯、莫斯科政权是保留着世界上唯一的东正教的政权和俄罗斯民族是东正教信仰的唯一承担者——在俄罗斯民族中苏醒过来。”^②“在俄罗斯人心中，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还因为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大国”^③，坚信自己是上帝意志的真正信仰者和捍卫者，负有拯救一切受难的基督臣民并将其合并到统一的俄罗斯当中的“历史使命”。这种强烈的宗教使命感和普世主义理念为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心理依据。俄国军队打败拿破仑拯救了欧洲，苏联红军打败法西斯德国，拯救了世界，这些历史功勋更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宗教使命感。

（二）东正教特点与俄罗斯村社制度、习俗的契合

东正教特点与俄罗斯村社制度、习俗的契合主

^① [俄] 帕·尼·米留科夫：《俄罗斯文化史纲》俄文版第二卷第1册，莫斯科“进步—文化”出版社和“劳动”报社1994年俄文版，第31页。转引自刘祖熙：《夏日堂史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② [俄]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③ 学刚、姜毅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要有三个方面，东正教的聚合性与村社集体生产方式的结合，使集体主义精神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主要特征；东正教上帝之爱的怜悯情感和村社中的同情心共同造就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基督教教义中的戒律与村社生产、生活原则的吻合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道德标准。

第一，俄罗斯人忽视个性独立，钟情于集体主义，愿意在集体中生活，相信集体的力量，依恋于家、村社和国家。俄罗斯人的集体意识非常强烈，村社中广大的农民甚至不知道个人还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个体而存在。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集体主义特征，其历史基础是东正教的聚合性和村社生活中的集合性。东正教要求人人相互帮助和团结一致，教徒有一种极强的群体意识，认为得救是集体的事情。聚合性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中心。“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一词的词根来源于教堂，即它首先是指具有共同信仰的俄罗斯人东正教生活的同一性：在教堂里，所有的人一起举行共同的宗教仪式，但每个人保留独立的自我，对上帝进行个人的祈祷，以自己的行为面对上帝，最后达到同一。这是在每个人对于基督自由之爱基础上的全体的统一。”^①霍米雅科夫最早指出俄罗斯思维的这一特性，聚合性的概念也是他创造来说明共同性特征的，认为东正教“是统一性与自由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建立在爱上上帝及其真理和爱上上帝者之间互爱的基础上。……在天主教那里是有统一而无自由，而在新教那里是有自由而无统一”。聚合性是基于爱上上帝和爱上上帝的人们之间自由的统一，统一是主要的，而自由的前置条件和互爱则高度集中概括了俄罗斯民族的最主要特性：集体主义、国家至上包含在统一互爱之中，而爱上上帝则道出与东正教有关的一切民族特性。霍米亚科夫的聚合性原则同民粹主义的奠基人亚·伊·赫尔岑的村社性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赫尔岑认为，俄国人民，首先是俄国农民，必须把个性原则与村社性原则结合起来^②。

俄国农村公社从13世纪开始出现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初，它的性质是农民共耕社、向国家和封建主负责的集体，在村社中，集体活动是人们的主要活动方式。在农民们看来，土地与个性和政治自由相比，重要程度远远高于后者，因为国

家法律不允许个人自由流动，离开村社，离开土地，个人几乎无法生存，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才能在世上立足。

集体主义精神充斥村社生活中，俄国广大地区都长期保留着生产互助的习惯。具有代表性的像村社中剥亚麻、一起收卷心菜、向休耕地运肥、纺线等。互助还表现在村社的社会福利与救济职能上。当一家一户遭遇灾难和不测时，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对村社中的困难群体和特殊家庭，如鳏寡孤独以及服役士兵的家属，村社也都予以照顾。年景不好时，村社会拿出集体公益金赈济穷人。在成员失火、生病、牲畜倒毙时会得到村社无条件的帮助，一般不会沦为赤贫。村社还要求成员轮番照顾孤儿生活，而且要教授孤儿地里的农活以使其长大后能自食其力。

在村社，集体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上述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互助外，公共聚餐、宗教活动和世俗仪式也是常见的集体交流方式。在宗教节日里，同一村社的成员会聚餐进行庆祝，世俗节日以及每家每户婚丧嫁娶也总免不了聚餐活动。在这里，集体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平均主义也由于村社土地重分制度而成为一种传统。村社在土地分配和租税分摊上实行平均主义原则，租税还实行连环保制度，并为减少农民之间的差异采取一系列措施，避免财富向拥有土地的农民集中。在村社中，将个人生活公之于众是很正常的事情，个人、家庭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所以人们一般不会刻意去隐瞒什么事情。

凡此种种促成全村人结为一个整体，集体意识无须求证，已经膨胀成为大众的共同心理。人们从不怀疑村社的权威，认为为维护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村社培育出来的集体主义心理，与东正教的群体意识相吻合，形成了俄罗斯性格中的交出个性自由和责任，服从于集体、国家、政权及其代表者的集体性，也进一步促使东正教成为“溶解于民族的集体自然力，溶解于动物的温暖中的宗教”。在这种宗教信仰中，“宗教的个人因

^① 白晓红：《俄国与西方：俄罗斯观念的历史考察》，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刘祖熙：《夏日堂史集》，第6页。

素发展很弱；这种宗教信仰害怕脱离集体的温暖而经历个人的宗教信仰的炼狱之火”^①。

第二，俄罗斯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这种人道主义来源于东正教，并深深扎根于村社的生活之中，指导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成不变的东正教传承了基督教有神论的人道主义传统，由神来保证人道的实现。被耶稣受难的榜样神圣化了的态度在俄罗斯人中产生了长久忍耐的哲学和美学，产生了听天由命的服从，产生了对人无能为力的状况听天由命的服从的哲学和美学^②。农民对弱者大多富于同情心，慷慨好施，乐于助人，不拒绝借宿的陌生人和乞丐。生活在村社中很少识字的农民们，对圣经教义的领会靠的是乡村教士的宗教活动，广大乡村教士们承担着继承和培育村社中的人道主义传统的责任，农民们被教导向往着上帝的爱，一般人的理想即为，生活在沙皇的“父亲般的关怀”下，爱和尊敬一切人，“包括亲近的人和疏远的人及自己的仇敌。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着上帝的形象，而且，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流了鲜血”^③。

第三，村社按圣经的戒律安排农民的生活。

俄罗斯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在其所著的《俄国社会史》中对改革前的俄国重分型村社的生活原则进行了总结。一共有17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村社的道德准则是具体的圣经戒律。

村社通过东正教对农民实行内化的控制，通过对神的惩罚的恐惧来巩固社会秩序。在村社的生活原则中，可以看到摩西十诫的影子。根据第一条戒律，村社要求农民不要相信自己，而要信奉上帝，将希望寄托于上帝的宽厚和仁慈。根据第二条戒律，村社反对农民贪图财富，迷恋美食，追逐权力，羡慕虚荣。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普遍适用于村社的各项事务，一旦违背了承诺和誓言，就会被视为犯了第三条和第九条戒律中所说的大罪。严禁在礼拜天和其他节假日劳作，与第四条戒律如出一辙。对老人和父母要言听计从与第五条戒律中的孝敬父母内容基本相同。对杀人和偷窃的惩处取自第八条和第九条戒律。要知足如同第十条戒律^④。

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村社的职能和生活原则发生了部分改变，但一些基本精神仍然保留

下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

（三）俄罗斯东正教对皇权的依附

与天主教不同，东正教不设教皇，其宗主教们都隶属于希腊皇帝。在西方，王权和教权是分离的，中世纪时教会曾长期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但东正教会却从未获得过这样的地位，王权和教权没有过分分离，教会始终处于世俗政权的掌控之下，区别仅仅在于控制的松弛而已。

由于秉承拜占庭皇权与教权关系的传统，罗斯东正教会从一开始就处于依附世俗政权的地位，教会需要依靠王公的什一税及馈赠来维持正常活动，这些都决定了罗斯教会的职能只是保护王权。为配合王权的统治，教会一直向民众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但比较而言，早期教会还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东正教一直关心国家的统一，在反对鞑靼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莫斯科王公有较大的影响力。在罗斯公国封建割据年代，东正教一直保持着这种影响力。15世纪中期，利用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于佛罗伦萨通过东西教会合并决议，拒绝服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在拜占庭帝国覆灭后，罗斯东正教自命为东正教唯一之大统，莫斯科都主教区得到了希冀已久的独立，但也因此更加依赖莫斯科大公。

1547年伊凡四世按拜占庭方式举行了登基仪式，并按拜占庭皇帝的称呼开始正式成为沙皇。在这一时期，教会还在尽可能地争取自己的地位，试图对皇权施加一定的影响。“大动乱年代”过后，宗主教尼康的宗教改革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明显削弱了教会的力量，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教会地产的剥夺后，东正教彻底沦为官办宗教，演变成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成为沙皇的统治工具。

俄国历代统治者都利用东正教强化政权，巩固沙皇制度。在东正教的培育下，人们形成了这样一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льба России. М. 1997. С.235. 转引自黎海波、宋瑞芝：《论东正教与俄罗斯村社文化的亲和性》，载《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朱达秋、周立：《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③ 参见黎海波、宋瑞芝：《论东正教与俄罗斯村社文化的亲和性》。

^④ 参见[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页。

种观念：皇帝不仅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圣者，是上帝的代理人，是人民的保护者。“第三罗马”理论形成于俄罗斯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时，俄罗斯民族形成时期，对俄罗斯国家性质和民族性格影响巨大。沙皇集权的权力结构起源于伊凡四世，他利用“第三罗马”理论成功地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俄罗斯的统治者由此攀上了至高无上的权力顶峰。所以说，“弥赛亚意识”和“第三罗马”理论不仅强化了俄罗斯国家权威，而且再一次强化了君主的力量和权威。“俄罗斯宗教的特殊使命是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①沙皇身上寄托着俄罗斯民族的理想，君主成了完成俄罗斯民族崇高使命的承担者。普通民众坚信只有把上帝、君主和人民的力量融为一体，才能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

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君主专制已经融入俄罗斯人的精神之中，俄国人形成了忍耐、顺从的性格，也自然而然地对权威心生敬畏。到18世纪时，甚至国家各等级的人都被奴化了，包括农民、城市市民，也包括贵族和僧侣。他们不仅接受专制，而且崇拜君主。人们认为，沙皇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是所有臣民的主宰，沙皇有权支配臣民的自由、健康、生活和财产；人们一直期盼着救世主的出现，期盼着在全知全能全善领路人的带领下到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历史上经常出现个人集权统治的一个原因。

（四）东正教教义与俄国知识精英精神的一致

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经常充当现存制度的反对者，生活在过去和将来而不是眼下。在俄国知识精英们探讨、寻找俄国历史、未来以及人类的终极目的等问题的思辨和行动中，东正教的影响显而易见。

弥赛亚意识普遍体现在俄国知识分子身上。“自从‘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将救世使命的标签贴在俄罗斯身上后，就再也没有取下来，而且随着历史的进程，‘这一理念衍经斯拉夫主义，绵延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再赅续到现代的斯拉夫主义’。”^②

东正教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在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战中。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应

该也可以走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因为俄国拥有一笔宝贵的财富，就是其独特的地缘环境、独特的历史轨迹、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尤其是俄国的东正教，作为本国民众的精神支柱，因为保存了基督教义的正统性、纯洁性，保持了精神的内在完整性而优于西方的基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东正教是真正的基督教，只有俄国才真正崇拜上帝，上帝是俄国的上帝，其他民族崇拜的不过是假神灵。“只有俄罗斯思想、俄罗斯上帝和耶稣”才能使人类获得新生^③。西方派承认俄国历史的独特性，但认为俄国也正为此而处于落后的境地，摆脱落后的途径就是在世界历史共同发展规律的指导下师从西方。他们批判斯拉夫派浪漫化、理想化俄国历史。双方针锋相对，但在俄国特殊论上却意见一致。

尘世天堂、千年王国、乌托邦是俄罗斯思想固有的宗教内蕴，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巨大的社会变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总在希望借助于某种机缘，一劳永逸地一次性解决所有的终极难题，把人类带进新世纪的精神王国里去。

东正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还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东正教的和谐统一。俄国早期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身贵族，“忏悔的贵族”只存在于俄国。19世纪中期，俄国平民子女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女进入高校学习，俄国出现了平民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身上有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无论是贵族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知识分子。充满人道主义的俄国知识分子对处于奴隶境况的底层人民充满负罪感，觉得自己有责任解救他们，承受苦难，像基督耶稣那样为了拯救人类走上十字架。东正教的献身榜样激励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他们从对穷人、农奴的同情和怜悯而生发出要求根本废除农奴制，甘为正义、为人民、为理想牺牲。俄国最早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知识分子的贵族出身，造成了底层民众由于不信任“贵族老爷”而怀疑持

^①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页。

^② 张昊琦：《俄罗斯帝国思想初探》，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③ 同上，第127页。

反沙皇立场的上层知识分子，俄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人民牺牲却不被理解的极大痛苦，更凸显出知识精英的殉道意味。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的拯救人民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使他们成为政治革命的领军人物。

俄国作家有一种特别的传统，那就是在他们写作过程中，总是饱含着对俄国下层民众不幸的深切同情，对人类苦难的由衷关切，19世纪的俄国文学因此具有了一种特别动人的精神感召力。拉吉舍夫说过“我的心为人类的痛苦所充盈”。托尔斯泰的“泛道德主义”具有特别的力量。托尔斯泰认为，只有基督之爱才是拯救俄罗斯尤其是俄罗斯贵族于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之泥潭的唯一出路。他把基督之爱归结为三条：爱一切人，不以暴力抗恶^①，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托尔斯泰看来，要根除人身上的“动物性”，也就是人身上的“恶”，一切的法律与武力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在基督爱的原则的引领下，不断地忏悔，自我反省，才能涤清心灵的罪恶，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人类才能变得美好，人类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善恶问题就是人类的终极问题，这个问题只有靠人自己完成，只有在人的内心里完成^②。

关注内心、重视情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追问人类归宿一类的终极问题时，深刻体验到了人类的局限和孱弱，人间的苦难盖源于此，每个人都面临着相同的结局。他们将改变社会的不幸、拯救人类视为己任，呈现给世人的是博大的同情与悲悯之心。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虔诚狂热的宗教献身精神相结合，加重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激进、极端的色彩。由知识分子作为主力的激进主义者坚持与保守势力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认为在俄国通向自由天地之路上，专制是加快前行速度的一股推力；而暴力和残酷又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有效工具；为了到达善的彼岸，恶亦可做摆渡之舟。

三、结论

民族性格是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和特定历史条件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积淀成就了民族性格。勒温曾提出个人生活场的概念，强调民族性格是个人与环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的

结果。它的形成机制是文化心理的积淀，所以民族越古老，历史越悠久，民族性格就越固着、含蓄，因而也就越带有惯性和惰性^③。苏联学者勃罗姆列伊认为民族的人格（性格）本身最终是文化决定的，它又是一个民族的特殊文化面貌的某些特点的一种内部支柱。文化的内部结构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化的存在方式是主要的结构之一，其存在的方式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其一为人们内部的社会意识；其二为社会意识在行为和行动中的表现；其三为“物体化的”活动结果（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④。宗教既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是文化的主要形式，所以说，虽然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最终形成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宗教因素对人的价值观念和整个社会的态度体系的深层影响也即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却是最为根本的。

基辅罗斯建立于公元862年，100多年后，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从拜占庭引进了东正教。算起来，此时应该是俄罗斯民族的儿童时期，正是其民族性格形成之时。一个民族最本质的性格特征都是在其早期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确定的。在接受东正教之前，俄罗斯文化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具有代表性特征的文化类型或模式。东正教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其民族性格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列昂节夫说：东正教不是俄国人创立的，而是拜占庭人创造的，却已经被我们如此掌握了，以至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它就根本不能生存了^⑤。作为一种信仰，东正教在俄罗斯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随处可见，左右着俄罗斯人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成为俄罗斯人文化模式的核心、精神表达的准则以及行为模式的定因。民族性格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信奉集体主义，崇拜强权，爱走极端等特征都可以在俄罗斯东正教中找到根源。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张兴宇：《跨越时空的对话——孔子“仁”的思想与列夫·托尔斯泰“爱”的学说比较》，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3期。

② 参见屠茂芹：《俄罗斯民族信仰的特点与托尔斯泰的宗教观》，载《东方论坛》2003年第3期。

③ 同上。

④ 参见李静：《民族心理学》，第482页。

⑤ 转引自陈黎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JIN Huixin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joint action, but the deep influence on the value of national concept and the attitude system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haracter form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The third Rome" theory and "messiah" concept soaked in the Russian's consciousness, which made the national strong "salvation" mission sense, and then turned into the sense of big-country ideal and strong nationalis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Russian village system, the Orthodox's dependence on imperial power, the consistent of the Orthodox doctrine and Russian intellectual elite spirit, became the root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s which conclude humane, compassionate, believe in collectivism, worship of power, extremes, etc.

keywords: Russia; national character; Orthodox

Влия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фактора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Цзинь Хойсинь

【Аннотация】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складывался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под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множества факторов, однако осно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ценносте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общества в целом оказал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усских глубоко укоренена идея "третьего Рима" и идея о мессианской рол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отсюда возникает идея спасе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а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все это перерастает в "русский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ый шовинизм" и сильнейш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в России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и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й сельской общины и традициям, подчинение Церкв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власти, един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элиты 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вероучения, привели к появлению в рус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характере таких черт, как сострадание,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 вера в коллективизм, уважение к власти, склонность впадать в крайнос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авославие